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

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陈文新 余来明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科举制度与明清社会”资助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

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陈文新 余来明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文新,余来明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307-10326-9

I. 科… II. ①陈… ②余… III. 科举制度—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D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224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0.25 字数:735千字 插页:2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326-9/D·1201 定价:7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祝愿科举文化研究走向繁荣昌盛

- 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绍基 (1)

致贤用才 科举先声

- 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辨析…………… 张亚群 (3)

唐代试律诗辑考…………… 罗积勇 刘彦 (10)

唐代武举研究简述…………… 许友根 (18)

再谈历史上惟一的状元驸马——郑颢…………… 周腊生 (28)

宋人登科年代考…………… 李裕民 (36)

文韵、欣韵同用考…………… 肖金云 (45)

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 高福顺 (51)

金代科举制度考述…………… 薛瑞兆 (63)

论元代科考特点的文化根源…………… 龚贤 (78)

《经世大典序录》官学资料辨析

- 兼论元朝科举对官学教育的影响…………… 邱逸凡 李弘祺 (84)

明代科场案与明代政治

- 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白金杰 (101)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见“御用文人”…………… 江俊伟 (112)

明代八股文与思想文化

- 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的讨论…………… 朱燕玲 (123)

八股文的“有用”与“无用”

——写在《明代八股文编年史》前面…………… 陈文新 王同舟 (135)

明代古文与八股时文关系新论…………… 周 勇 (138)

明代会试考官初探

——以会试录为中心…………… 大野晃嗣 (148)

担任乡试考官的进士教职…………… 三浦秀一 (169)

科举与李贽…………… 金惠经 (177)

万历四十四年科场弊案始末考…………… 鹤成久章 著, 陈翀 译 (188)

从科举的视角考察张溥及其八股文选本…………… 王 炜 (196)

日用应酬尺牍选集中的科举文献

——以明末《如面谈》、《如面谭二集》为例…………… 侯美珍 (205)

顾炎武《日知录》中科举说初探…………… 水上雅晴 (222)

“反科举”话语与历史的实际情景

——以黄宗羲、顾炎武等关于科举的言论为例…………… 甘宏伟 (237)

试论地方志中科举资料的不足

——以明清江西方志为例…………… 邱进春 (244)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刊误述论

——仅限清代文进士省级籍贯…………… 吴根洲 (250)

清代进士资料考辨…………… 翟国璋 (258)

清初学界对《大学》、《中庸》非孔孟之书的批判性考辨举证…………… 朱修春 (267)

朱卷与《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 张 杰 (272)

《国朝贡举年表》的版本及价值述略…………… 鲁小俊 江俊伟 (279)

清代科举宾兴文献综论…………… 毛晓阳 (286)

清代童试中的“异地借考”问题

——兼论当今高考“借考”政策…………… 刘希伟 (295)

清代武科举考试法规文献研究

——以《钦定武场条例》为例…………… 王晓勇 (303)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与清朝文学的起步

..... 竹村则行 著 陈娟、吴二林 译 (314)

《儒林外史》的叙事策略与情感基调

——兼谈《儒林外史》研究者对科举的误读 吴光正 (326)

王步青八股文批评述略 陈水云 (336)

宁波清代状元章鋆散论 王宏星 (346)

论科举废止前后张之洞对国粹的保存与拯救 顾瑞雪 (353)

晚清科举革废与士的转型

——论晚清小说《学究新谈》 汤克勤 (363)

科举魁星崇拜初探 张晓雪 胡 凡 (368)

千年科考惨淡隐退的“台前幕后”

——基于文本社会学方法的叙事学研究 冯用军 (380)

借鉴科举阅卷方法，控制主观题评分误差 胡 平 (391)

近百年以来八股文研究综述 黎晓莲 (396)

近十年国内关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综述 方 宪 (405)

再谈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科举录之保护利用 谷 敏 (418)

朝鲜科诗选集《近艺隽选》研究 刘 婧 (427)

越南的儒教科举与儒学科举文献 丁克顺 (441)

进士题名碑及越南中代儒学科举制度之教育政策 郑克孟 (449)

科举文献中的考试须知：从《贡举条式》到《三场程式》(摘要)

..... 刘海峰 (460)

明代解元群体构成考述(摘要) 郭培贵 (462)

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摘要)

..... 柯任达(Thomas D. Curran) (463)

民国高等教育

——评估废科举是否适时、成功的关键(概述) 沈登苗 牛翠萍 (465)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摘要) 张思齐 (468)

论明代科举发展与选官世袭制的终结（摘要）	屈超立（470）
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摘要）	叶楚炎（472）
清代朝考之始及类别探讨（摘要）	邹长清（474）
科举正途官员与杂途官员	
——通过同乡会馆的建立看清末官僚社会的变革（摘要）	水盛凉一（476）
其他提交会议论文目录	（478）

祝愿科举文化研究走向繁荣昌盛

——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邓绍基

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盛会，聆听高论，结识朋友，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感谢会议发起单位和陈文新教授的盛情相邀，使我获得这次学习机会。陈文新教授嘱我在会上作一发言，我很觉惭愧，因为我对科举制缺乏研究，只能谈点感想。

研究古老的科举制，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程度上研究科举文化，是一项开拓性工作，它是在近30多年开始并发展起来的，是百年来文史研究事业中的一项重要突破。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百废待兴，文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回忆起80年代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方法论的引进和丰富，即所谓“新方法的爆炸”。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看，当时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组织工作，我记得无论《文学遗产》还是《文学评论》等召开的座谈会，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求提倡并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求开拓，而开拓也是创新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我们认识到，这种呼吁并不局限于文学史，而是遍及整个文史研究领域，如果联系百年来的文化新变及其存在的缺失，上述呼吁更具有全局性意义，而非仅仅是一个局部性问题。

大家都知道，一百多年以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个时期，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文化界发生的文化新变，即文化革新运动，包括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一个主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打破意识形态的封闭，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化，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也受到这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潮流的影响，形成了近百年文史研究中的一个好传统。当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清算对象之一，不免存在过激态度，加之方法论上的形式主义之弊，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乃至出现虚无倾向。科举制度是在1905年由清政府明令废除的，那时正经历了庚子事变，对腐朽的清政府来说，或许只是表表姿态，但按当时历史实际，这个事件是同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五四”时期，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过激口号下，对八股文，连带着对“八股取士”和“封建科举”也就自然全盘否定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在理论上拒绝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的形式主义弊端，但在实际行动中多有人们通常说的“左”的错误，跟八股文紧密联系的科举制这样的课题不会受到重视乃至很可能遭到排斥。所以，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扩大文史研究领域问题，必须联系一百多年来的文史研究的历史语境来认识。否定之否定，是认识上的提高和飞跃，也是辩证法对形式主义的交换和代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革新运动中有革新派和守旧派之分，但无论是革新还是守旧的学人恐怕都不会预料到，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古代文化的“位置”会安放在一个更广大的国际空间。他们也难以预料到，一百多年以后，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还有大量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其中还有不少人研究汉学，包括研究古代文化。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事，也是盛事，它固然可以增添我们的自豪，但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们的责任感。这样，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工作的推进和提高，就兼有世界意义了。正是持着以上认识，我以为，应当从更广阔、更深远的全局意义上，也就是战略意义上来认识我们的古文化研究事业。

我从有关文章中得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科举文化研究已取得诸多成绩，已出版著作300多部，发表论文3000多篇。尤其是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诸多单位的学人参与编纂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对推动科举文化研究，更有巨大贡献。我还知道，目前这个大型丛刊的编纂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将使科举文化研究增添后劲。此时此际，讨论科举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讨论“科举学”，可说是适逢其时。

我一向认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当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首先，这一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当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性著作；再次，出现一批专攻和兼攻这门学术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乃至权威学者。我想这三个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目标，或许还是到达“显学”的目标。研究古代的科举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方面，“科举学”的内涵必然十分丰富，也就会吸引和汇集多个方面的研究人才。我衷心祝愿科举文化研究发达昌盛，祝愿“科举学”成为一门学术显学。

2011年9月24日于武汉大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文学所副所长）

致贤用才 科举先声

——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辨析

□ 张亚群

在中国古代选才思想史上，葛洪（283—363年）具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现存五十卷，多涉及举贤用才问题，犹以《勖学》、《君道》、《务正》、《贵贤》、《任能》、《钦士》、《审举》、《备阙》、《擢才》、《名实》、《清鉴》、《尚博》、《仁明》、《广譬》、《行品》诸篇论述集中。迄今，学术界对于葛洪在道教思想、医学养生、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文学、音乐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发表了颇多研究成果，也有论者从人才学的角度探讨其思想贡献。^①本文从科举学的视角，辨析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进而探讨其在中国科举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治国以举才为首务

葛洪生长于士族统治时代，察举制衰微，九品中正制盛行。其祖父洪系，仕吴任大鸿胪；其父洪悌，仕晋为邵陵太守。他虽出身士族家庭，但13岁丧父，“饥寒困瘁，躬执耕稼”，在困境中刻苦自学。“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②其后至二十岁之数年间，葛洪受学从祖葛玄弟子郑隐，悉得其炼丹秘术。^③这一

^① 相关论文主要有：焦传斌、李哲夫：《〈抱朴子·外篇〉中的人才学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李德明：《论〈抱朴子〉人才思想及其艺术表述》，《镇江师专科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李军：《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刘玲娣：《〈抱朴子〉人才思想论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瀚青、梁瑞敏等：《葛洪的学习和人才思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卿希泰：《试论葛洪的知人善任思想》，杨世华主编《葛洪研究二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韩绍深：《浅论〈抱朴子〉之人才观》，《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② 《抱朴子·自叙》，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3、655页。

^③ 钱穆：《葛洪年谱》，刘固盛、刘玲娣编《葛洪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家学传统与博学阅历，对其人才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治国思想，“虽然他自己说《外篇》属儒家，但从其具体内容、主张来看，应该属于秦汉以来的黄老新道家”。这种“黄老”思想具有鲜明的“入世”特征。^①这是身为道教名家的葛洪，为何深究社会治乱缘由、默察用人得失之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葛洪的“知人善任”思想，“是对《太平经》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②，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人才观具有丰富内涵，集中反映在对人才功能、人才标准和人才使用的认识上。

葛洪认为，贤才在治国安邦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举贤任能是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抱朴子外篇·贵贤》（下文引本书仅注篇名）指出：“无良辅而羨隆平者，未闻其有成也。”“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乐治定而忽智士者，何异欲致远途而弃骐驎哉！”《审举》篇进一步阐释“举才”的原因：“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

因此，他提出，明主“不吝金璧，不远千里，不惮屈己，不耻卑辞，而以致贤为首务，得士为重宝。举之者受上赏，蔽之者为窃位”^③。在《百里》篇，他还论述政府基层人才的重要性：“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则国事不举，万机有阙。其损败，岂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长尤宜得才，乃急于台省之官也。”

在《名实》篇，他列举周之吕尚、汉之娄敬、秦之百里奚、齐之管仲的事例，阐明任用贤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才诚足委，不拘于屠钓；言审可施，抽之于戎戍。或举于牛口之下，而加之于群僚之上；或拔于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勋业隆济，拓境服远，取威定功，垂统长世也。”由此得出结论：“故明君勤于招贤，而汲汲于擢奇，导达凝滞，而严防壅蔽。”

在人才标准方面，葛洪称赞孔门“四科”及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诏书“辟士四科”，认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经术”、“法律”、“谋略”均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他列举：“尼父善诱，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④在《审举》篇，他以汉代察举为例，提出：“然未贡举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简标颖拔萃之俊。”

葛洪采用设问的方式，阐明理想的选才标准。《尚博》篇载：“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识矣。文之体略，可得闻乎？’抱朴子曰：‘荃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荃；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闻。……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

① 熊铁基：《论葛洪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刘固盛、刘玲娣编《葛洪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② 卿希泰：《试论葛洪的知人善任思想》，杨世华主编《葛洪研究二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③ 《抱朴子·钦士》，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325页。

④ 《抱朴子·勤学》，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122页。

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文之所在，虽贱犹贵。’”

在《审举》篇，他以比喻的方式，论述“言”与“文”在人才选拔中的独特作用：“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

值得指出的是，葛洪特别重视选才标准的公平公正性。他指出：“夫铨衡不平，则轻重错谬；斗斛不正，则少多混乱；绳墨不陈，则曲直不分；准格倾侧，则渣杂实繁。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立之朝廷，乱剧于棼丝。引用弩庸，以为党援，而望风向草偃，庶事之康，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弦不调而索清音哉！何不澄浊飞沉，沙汰臧否，严试对之法，峻贪夫之防哉！瘁攸阶，可勿畏乎？”^①

他抨击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用人标准颠倒的黑暗现实：“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勉）治生。’盖疾之甚也。”“而凡夫浅识，不辩邪正，谓守道者为陆沈，以履径者为知变。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②

在《吴失》篇，他引述其师郑隐的教诲：“吴之晚世，犹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斥，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财）有力者，躐云物以官跻。”这些反面事例，足以作为后世之借鉴。

在人才使用方法上，葛洪主张灵活、务实、不拘一格。他批评“世俗神贵古昔而黜贱同时”之盲目崇古心态，反对今不如昔的人才短视行为，指出：“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③他认为：“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且夫爱憎好恶，古今不均，时移俗易，物同价异。”“故圣世人（衍人字）之良干，乃暗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洁，乃末叶之羸劣也。”^④

人才使用不仅要适时变迁，且要因因人而异。他指出：“无以一事阉保其余，同乎己者，未必可用；异于我者，未必可忽也。”^⑤《广譬》篇从多方面论述了人才使用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人才无定珍，器用无常道。进趋者以适世为奇，役御者以合时为妙。”“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胶柱不可以谐清音。”在人才使用上，应把握“济事”、“化俗”的根本原则：“四渎辩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途同归。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物贵济事，而饰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绵布可以御寒，不必貂、狐；纯素可以匠（匡）物，不在文辩。”

此外，葛洪还提出人才应各尽所长、用人惟“明”等原则。《备阙》篇说：“役其所

① 《抱朴子·审举》，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385页。

② 《抱朴子·审举》，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393~400页。

③ 《抱朴子·尚博》，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118、120页。

④ 《抱朴子·擢才》，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456页。

⑤ 《抱朴子·清鉴》，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512页。

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其弃材矣。”《务正》篇也指出：“若以所短弃所长，则逸佻拔萃之才不用矣；责具体而论细礼，则匠（匡）世济民之助不著矣。”《仁明》篇则强调：“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无臧否之明，则心惑伪真，神乱朱紫”。这些都反映其对人才使用的精辟见解。

二、士品分类与识士之难

如何识别真才，是能否举贤用才的又一关键问题。葛洪在总结、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才分类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其论述集中在《行品》篇。他剖析 38 种善人、44 种恶人的各种特征，提出系统的识别、选择和考验的途径及方法。他认为举贤原则，应是勤学、修德、无私、通经策、有才略，并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验证。葛洪归纳善人的 38 种品行特征，表现为：圣、贤、道、孝、仁、忠、明、智、达、雅、重、清、义、信、文、武、儒、益、廉、贞、笃、节、辩、谦、顺、干、理、术、勇、严、艺、勤、劲、审、果、谨、良、朴；又总结恶人的 44 种品行特征，表现为：悖、逆、凶、恶、虐、谗、佞、暴、奸、谄、虚、贪、淫、暗、损、劣、弊、邪、悍、怯、浅、顽、惑、薄、妒、吝、愚、小、迷、奢、荒、懒、轻、秽、笨、器、蔽、乱、拙、慝、骄、叛、伪、刺。

纵观往迹，俯察世事，葛洪深感识士之难：“人技未易知，真伪或相似。”他结合历史事例，列举人才之难以分辨的十种状况。如：“士有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盘旋成规矩。然心蔽神否，才无所堪，心中所有，尽附皮肤，口不能吐片奇，笔不能属半句；人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动静无宜，出处莫可”；“士有貌望朴悴，容观矬陋，声气雌弱，进止质涩。然而含英怀宝，经明行高，干过元凯，文蔚春林。官则庶绩康用，武则克全独胜”；“士有谋猷渊邃，术略入神，智周成败，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无宜；而口不传心，笔不尽意，造次之接，不异凡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分析，葛洪在人才鉴别上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夫物有似而非，若然而不然。料之无惑，望行得神，圣者其将病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结交，不可以不精择，不可以不详试也。”^①那么，如何“精择”、如何“详试”呢？

三、考试选才的途径与方法

一般认为，西汉董仲舒首次使用“考试”一词。《春秋繁露·考功名》提出：“考试之法，大者舒，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计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弟之”^②。其后，“考试”一词在官文、史书中逐渐传布。《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记载：“昶陈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葛洪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通过“考试”来鉴别、区分人才的学者，但却是极力提倡恢复考试选拔儒学人才的士

^① 《抱朴子·行品》，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 555 页。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之《考功名》，岳麓书社 1997 年版，第 109 页。

人。《抱朴子·外篇》多次提及“考”、“视”及“考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对考试这一选才途径和方式的重视。葛洪论“考试”，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关于考试选才的目标与标准。《君道》篇在论述“君”、“臣”的各自职责后，指出贤君应纳良言、定良规：“勿惮徙薪之烦，以省焦烂之费。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试之准的。”认为“昏惑之君”，“官人则顺志者为贤，擢才则以近习者为前。……器小任大，遂及于祸”。

其二，考试与学习之关系。葛洪不单纯就考试论人才，而是将其与学习涵养联系起来考察，重视学习在成才中的先导作用。《勤学》篇指出：“夫学者所以澄清性理，扬埃秽，雕煅矿璞，奢炼屯纯，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他还强调人的才智不是天生的：“夫斲削刻画之薄伎，射御骑乘之易事，犹须惯习，然后能善。况乎人理之旷，道德之远，阴阳之变，鬼神之情，缅邈玄奥，诚难生知。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钩（钩）之劲不就。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葛洪认为考试具有促进学习、激励学风的重要作用：“今试用此法（笔者按：指闭卷考经学），治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①反之，“今若取富贵之道，幸有易于学者，而复素无自然之好，岂肯复空自勤苦，执洒扫为诸生，远行寻师问道者乎？”因此，他力主恢复考试选才：“今若遐迹一例，明考课试，则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贿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②

其三，关于考试的方式方法。这主要集中于《审举》论述中。他重视发挥考试选才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主张以法从严治贪：“又秀才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罪（置）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中不中者勿署，吏加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赅而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与举者同罪。”针对“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的疑问，葛洪认为，考试是选拔经术人才之不可替代的方法，“言”与“文”能够反映人的才能。他说：“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暗蔽也。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

此外，葛洪重视对被举者品行、实际才能的考察。《审举》篇提出：“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访以详之，修（循）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间归其信义。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广譬》篇强调实际考察的重要性：“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俗有讙哗之毁，而未必恶也。是以迎而许之者，未若鉴其事而试其用；逆而拒之者，未若听其言而课其

① 《抱朴子·审举》，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404、410页。

② 《抱朴子·审举》，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414~416页。

实。则谄媚不以虚谈进，良能补益孤弱退。”

其四，关于考试实施的政治条件。他认为，西晋国家政治统一，为考试选才创造了现实基础；应重视采用考试手段选拔东南地区的贤才。《审举》篇说：“今普天一统，九域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而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参差而无检乎？江表虽远，密迹海隅，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以其土宇偏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他还指出：“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法有招患，令有损化，其此之谓也。今贡士无复试者，则必皆修饰驰逐，以竞虚名，谁肯复开卷受书哉？”

其五，关于考试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考试选才具有防止营私舞弊的特殊功能，提出：“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预作诸策，计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室矣。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矣。”^①

以上五点表明葛洪对考试具有深刻认识，成为隋唐科举考试之先声。这从一个方面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考试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西晋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士族政治也埋下了动乱的祸根。《抱朴子·外篇》最初写定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据杨照明先生考证，嗣后续有订补，历时约一两年之久。成书时，葛洪年约三十五六岁。这部著作是他目睹“八王之乱”、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后，对国家政治、人才得失的理性思考。东晋以降，《抱朴子·外篇》流传甚广，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南朝刘宋裴松之（372—451年）最早提及葛洪及其《抱朴子》。在其为陈寿《三国志》作注中，多处引用《抱朴子》的文字。梁元帝萧绎（508—554年），也受《抱朴子·外篇》之较大影响。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论及葛洪其人其著。唐人引述《抱朴子·外篇》者更为多见。^② 当今学者杨照明先生撰《抱朴子外篇校笺》，详细考证其文字、典故，并附有自《隋书·经籍志》至《意林》等历代有关《抱朴子·外篇》之著录，为我们勾勒出该书流传的大致情形。^③

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对后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在考试观念上，促进了考试选才观念的更新与传播。其《贵贤》、《任能》、《钦士》、《审举》、《擢才》、

① 《抱朴子·审举》，见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417页。

② 武锋：《〈抱朴子·外篇〉在历史上的影响》，《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③ 杨照明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730~742页。

《名实》、《清鉴》、《尚博》、《仁明》、《行品》等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才观念、考试观念，尤其是关于考试的教育与社会功能的认识，为千百年来人才选拔及教育实践所印证。“他提出严格选举、严明考试，以考试促进教育的光辉思想，却无疑是中国教育历史和考试历史的一大进步。”^① 葛洪提出考试可以绝“人事因缘”、窒“属托之冀”的主张，具有恒常的学术价值。这也是隋唐时代创建科举制度的一大动因。

其次，在考试方式方法上，《抱朴子·外篇》所提出的闭卷考试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为隋唐科举所借鉴。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这套考试方案，当然不完全是他的发明，但却是他的创新。如果把它与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相对照，则不难发现其中的历史联系。有不少可取之处。”^② 隋唐科举考试与公荐相结合，扩大了选才的范围及效度，推动了从察举选士到考试选才的变革。

最后，在考试科目与内容上，葛洪对经学、文学及策论的重视，对隋唐明经科、进士科考试产生一定的影响。“进士科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适应汉字文化发展的要求，选拔社会所需要的通识人才。”^③ 从考试文化的演化来看，进士科的源头可追溯到孔门“四科”之“文学”科，而《抱朴子·外篇》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葛洪有关文字、文学的独特见解及其注重韵语、骈言的写作风格，与《昭明文选》、唐宋以下“选学”的发展，不无渊源关系，对科举时代的考试文体亦有相当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① 李军：《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李军：《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张亚群：《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支独秀的原因》，《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唐代试律诗辑考

□ 罗积勇 刘彦

我们主要依据《全唐诗》等文献辑出《文苑英华》卷一八〇至卷一八九未收的疑似唐代试律诗，并进一步对其性质、初载文献进行考辨，找出《全唐诗》收录的依据，最后加以确定。我们所辑的唐代试律诗是广义的试律诗，不仅包括士子参加科举各级考试时按官方命题当场所作的诗，比如省试诗、州府试诗、国学试诗等，而且还包括省题诗。本文所说省题诗是指以往科举考试诗题或仿拟科举诗题而作的诗。省题诗中大部分是考生为了准备考试而自拟题目来作的，还有的是备试者练笔或非备试者因一时技痒而拿某年已考过的题目来作的。下面按省试诗（州府试诗附）、省题诗、省试或省题不可遽定者三类来叙述。

一、省试诗（州府试诗附）

1. 祖咏《终南望余雪》（有司试此题咏赋四句即纳或诘之曰意尽）（《唐诗纪事》卷二〇，《全唐诗》卷一三一）：“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按：《文苑英华》卷一五五“天部五·咏雪杂题”收有该诗，因未收于卷一八〇至卷一八九“省试诗”类，故此处仍加辑录。

按：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云：“姚合《极玄集》‘祖咏’下注：‘开元十三年进士。’元释圆至《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卷一四云：‘祖咏，开元十三年杜绾榜进士。’《唐才子传》卷一作十二年，疑‘二’为‘三’之误一也。”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云：“明高棅《唐诗品汇》卷首，顾应祥《唐诗类钞》卷首，李攀龙选、袁宏道校《唐诗训解》（日本旧刻本，1618年）卷首，《盛唐诗纪》卷首俱作‘开元十三年进士。’”今从之，祖咏当在开元十三年登第。

《唐诗纪事》：“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记：“《南部新书》卷乙：‘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当为《纪事》所本。”

唐代试律诗一般是六韵十二句，偶有八韵十六句。祖咏这首诗在科场是未完之试律诗，在文坛则被视作含蓄且完整的五绝。清人的试律诗选、注、评本中，大多收录了祖咏